

浅谈影响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译作《文学兴国策》

王 洁

(上海海关学院 外语系, 上海 201204)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异动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 中国近代社会的传统教化体系渐趋瓦解。有识之士更从制度和思想层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 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和学术思想予以极大的关注。由此, 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与光绪进士任廷旭一起合译的《文学兴国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此书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文学兴国策》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对中、日、西文化交流的互动作了探究, 并就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思考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学兴国策》; 文化互动; 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 I 1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5)01-0063-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1.012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in Japan* on th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Wang Ji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abnormal chang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penetra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traditionally educational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led to gradual disintegration. It made men of insight rethink fairly radically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Education in Japan*, accordingly, has won great popularity of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which was collaborated by Young J. Allen, a missionary of America and Ren Tingxu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arned the title of “Jinshi”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 on bo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deologi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t also ponders on the realistic meaning of moral education the book values.

Keywords: *Education in 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moral education

《文学兴国策》^[1]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译作之一。它是日本前任驻美公使森有礼(1847—1889)在1870至1873年任驻美中辨务使、代理公使等职期间,就日本维新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向美国各界有识之士征询的信函汇

集,原名为《日本的教育》(*Education in Japan*),于1873年在纽约出版。二十三年后其中文版《文学兴国策》出版。书中被征询者包括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的校长,还有哲学家、教育学家、实业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

收稿日期: 2014-12-01

作者简介: 王 洁(1962-),女,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教学。E-mail: w.jie126@126.com

等。该书被送交日本政府后引起重视,在认真研究后付诸实施。从那以后,日本的教育发展很快。

一、《文学兴国策》及其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反响

作为教育家的森有礼在美国期间,关注美国教育,调查研究美国教育,所咨询的问题包括:教育对一国物资繁荣所产生的影响;教育对商务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对农业、工业发展的影响;教育在人们的社会道德及自身完善方面的作用;教育对法律政体变革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在森有礼看来,这些是日本迈向近代社会的关键。森有礼1865年到英国留学时,开始认识到只有实行开国政策,才能达到护国之目的。他认为西洋首先是一些富国强兵之国,其次才是民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国际主义,这些思想成为他服务于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1885年他担任文部大臣后,相继颁布了多项教育法规,对原有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致使日本近代教育成为被赋予日本特色的国家主义教育,养成了尚武风气,奖励女子教育,普及实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机构为之一新,故被誉为“明治教育的中兴之祖”^[2]。

1897年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与光绪进士任廷旭一起合译了森有礼的这本书,并题中文书名为《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中的“文学”概念,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在这里,林乐知按古汉语的习惯,将“文学”作为“武功”的对应之词,取其“学问”、“教育”之含义,这也是当时社会的通用词语。译者在翻译题名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

《文学兴国策》出版后,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文人士子读后纷纷阐发自己的感想,认为:中国之学仅取民之秀者,给予上学的权利,以为只有士可学,百工可不学;且有男学而无女学,这些均属狭隘之偏见^[3]。《文学兴国策》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梁启超(1873—1929)在1890年至1892年间购买了制造局很多书籍和《格致汇编》,并据此在1896年冬撰写、修订出版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在此书的“学制”栏内列有《文学兴国策》,并将其作为“必读书目”之一。以藏书甚丰、辑著见例出名的徐维则(1867—1919)在1899年编著了颇有影响

的《东西学书录》,其史志部分也列有《文学兴国策》一书。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为其友人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一书作序,盛赞此书。蔡元培从1912年起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从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中可看出《文学兴国策》中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访日学者王韬也盛赞此书。1896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次年《文学兴国策》即翻译出版,成为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一个新的推动力。

二、《文学兴国策》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的影响及原因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西学东渐”的潮流,欧美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离不开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教会学校的推波助澜。他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导入中国,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他们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林乐知于1860年来到上海,致力于传教工作。之后,先后创办了上海中西女塾和中西书院,由致力于传教转向传播西学。林乐知长年住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十分熟悉。他选择此书,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不重视教育的普及、中国教育以科举为中心的弊端而发的。

森有礼的这本书为何在中国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这是因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化在近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社会经济结构异动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致使其教化体系渐趋瓦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已经彻底被世界万国的观念所取代,而曾经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尤其是华夏中心主义也在与外国的一次次摩擦、冲撞过程中逐渐消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中有识之士开始幡然醒悟,对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有了更深一层的警觉,并直接推动了以“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为旨趣、以自强图存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国人奋起学习西方。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日本武力撞击之下,人们被迫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寻找原因。而在

不断的思考与争论中逐渐意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在探讨中国战败的原因，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最为突出。他于光绪二十二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次年编译出版了《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书中详尽地探讨了中国战败的原因，指出日本教育至甲午战争期间已发展迅猛，日本的各类学校已有三万多所，教师人数达到了九万多人。而中国的教育在此期间则基本上没有变化。由此，林乐知认为，日本之强在于教育，而中国之弱也在于教育。因此中国要富强，首先要办教育。而与之同时翻译出版的《文学兴国策》为其姐妹篇，是一组试图以甲午战败为契机，对中国进行教育，从而促进变法的书籍。

林乐知鲜明地把教育与国家的兴亡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教育的落后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落后，也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林乐知由万物变化才会有活路的观点开始阐述，清朝的衰落是由于教育方法数百年来没有变化，而教育方法必须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变化。中国要变强，应该采取西欧的教育制度，采用新的学制，以变法自强。并指出了日本的富国强兵就是因为教育制度的革新。林乐知认为“专尚举业，有害无业”。他提出“废用八股文，采用西方学校的分科教育法，以栽培各种才能和兴趣的学生”。

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需要双方找到共同的契合点。此时，日本学习西方已见成效，中国学习西方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之风始盛。林乐知抓住了“办新式教育”这个契合点，因而产生了极佳的效果。林乐知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兴亡空前重要的说法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撼。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迫使有识之士重新审视西学的丰富内涵，开始从制度和思想层面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随即主动引进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和学术思想。《文学兴国策》在中国出现了“各省闻风兴起，群向购买”的狂热。从此，一个“教育救国”的口号开始流行，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成为晚清时期一个有声有色的运动。

《文学兴国策》是1896年4月出版的，同年6月，就有大臣奏请广开学校，7月又有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对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创议终于出现，而朝廷在听取了传教士和一些大臣的建议后，也终于同意开办大学堂，体现了把“教育救国”这一思想付诸实施的决心。在光绪为兴办京师大学堂所颁发的

诏谕中有这样的说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一个“急”字，就明显地流露出通过教育救国的热切愿望。

《文学兴国策》也更让国人看到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有识之士极力主张要引进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旨趣的新教化意识——公民道德。而孙中山更是把“自由、平等、博爱”比作其“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视为终身奋斗的革命纲领。

三、从英文版《日本的教育》到中文版《文学兴国策》探究中、日、西文化互动

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层面及深度，都是先前所无法比拟的。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译作让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

随着国际化、全球化潮流不断进展，以全球视野和比较方法对跨文化进行传播与接受日益受到关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约有一千八九百年之久，堪称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特别是两国在吸收欧洲文化过程中互为桥梁，可谓是中国文化关系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基本特征^[3]。在《日本的教育》英文版出版前后，日本通过中国的“汉译西书”吸收西方文化；而在《文学兴国策》出版后，中国通过日本学习欧美。与此同时，森有礼的《日本的教育》英文版中所撰写的“日本历史概略”部分，对美国人来说是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的重要读物，在此之前还没有美国人写过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籍，可见，这是一部在美国最早介绍日本历史的著作，对美国人来说颇具魅力。与此相比，林乐知的译本《文学兴国策》在中国的流传，引起国人对日本如何学习美国教育及取得成效的关注，从日本已获得的成效中增强学习的信心，开始了“照猫画虎”式地兴办新教育，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体制，给当时的知识界指引了近代教育思想之道，所以此书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这本书促进了中、日、西文化交流与互动。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重要演讲,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他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他还说,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主席所言道出了不同文化交流互动的现实意义。文化交流在当今正是要开拓更宽的视野,在互相尊重的态度下,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四、《文学兴国策》强调的道德教育思考及现实意义

《文学兴国策》把教育对人们的社会道德及自身完善方面的作用作为重要之点考虑,显示了其对民族兴旺、国家发展之重要。在此书所载的回函中,阿姆赫斯特学院院长施瑞恩谈到了教育的根基是道德情感;阿姆赫斯特学院教授西列指出,教育可以增进知识,但是对增进道德涵养很难,要更加重视道德教育——“德为万善之本”;威廉学院院长赫普经认为教育的根基不是智育而是德育;前美国总统加非德指出个人和家庭的伦常道德积极向上,有利于增加财富。而教育对伦常道德的影响很大,卢塔格斯学院教授满勒写道:“有德者必能有学,故道德日深,则学问日进,而教化必能持久,为终古进益之根基矣。”“吾人上下古今,而知有国者,非合学问道德以教民,终未见其能兴也。”他强调不要忽略情操和道德的教育。

现代社会道德问题层出不穷,一再突破人类所能忍受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将责问的目光投向教育,投向教育工作者。当今高校的主要任务似乎是专为生活实践及未来就业做准备。一切教学内容均被置于“是否有用”的标尺之下,这里的“有用”就是指是否能为个人带来物质利益。可以说,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在生存压力的催生中,人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其所体验到的生命力是一种资本,由此使得“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为了让‘智识与财产结盟’”^[4]。

然而,高等教育应该是在青年有了基本性格定向的前提下,努力培植其持续不断地完善自我的力

量,发展出自我的开放性,向着世界和他人敞开,向着更高的善敞开^[5],而非如眼下所看到的,高等教育指向就业,一切活动都在竞争思维的指挥下运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功能化的人。从教育实践史上看,现代之前的教育,虽然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多种多样的形态,但始终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教育是人解除生存负担之后提升灵魂的活动^[6]。《文学兴国策》把教育对人们的社会道德及自身完善方面的作用作为重要之点考量,足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教育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蕴涵着正向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等同于道德教化。因此,高等教育在满足个体谋生的基础性生存需要的同时,需要超越教育的实用目的而致力于人的整体性的培养。“人要谋生才能生活,然而,人若只为谋生而活则不复为人。”^[5]大教育家赫尔巴特说过,“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一个概念之中——道德”^[7]。在赫尔巴特看来,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

从《文学兴国策》中也能感受到: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在这向善的教育中,教师的作用不可低估。孔子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水平对他人的影响。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的言行对学生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的师德水平将会影响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大学教师历来被人们称为是道德的楷模,“身正为范”就是对大学教师道德要求的表述,由此可见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重要性。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大学教师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是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所以,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相比其他职业而言,大学教师是一项对道德的要求超过对知识技能要求的职业。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论断,大学教师是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大学教师只有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具备倾力教育的奉献精神,才有可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素质统一到未来人才培养的事业当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良心事业,这种事业要求教师担当起道德人的伦理角色,从而实现教学的教育性目的。《文学兴国策》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的根基是道德情感——“德为万善之本”。从中揭示出了教育应该有自己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育人”。“育人”是教育永恒的主题,“育人”是基石、是核心。

五、结束语

理性审视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学校变革的文化走向,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新气象, 《文学兴国策》的出现更是对其起到了推动作用。《文学兴国策》不仅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而且以论述欧美近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及思想原则为主, 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把教育对人们的社会道德及自身完善方面的作用作为重要之点来考量, 也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有关教育的问题上强调, 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我们要把教育始终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他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 我们要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应该说《文学兴国策》全书真正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论述, 即教

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重视教育则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反之则国家贫弱、民族衰败。毫无疑问, 这些论述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现实针对性。

参考文献:

- [1]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两卷[M]. 上海: 广学会译印, 1896.
- [2]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112-115.
- [3] 赵建民. 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19(2): 51-58.
- [4] 弗里德里希·尼采.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M]. 周国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5] 刘艳侠. 高等教育的“成人”品格[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34(11): 1-9.
- [6] 高德胜. 论道德作为现代教育之代价[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34(10): 1-9.
- [7] 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259-260.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58页)

参考文献:

- [1] 约霍尔. 女性主义[M]. 纽约: 拉杰斯大学出版社, 1991.
- [2] 斯台特森. 黑人姊妹: 美国黑人妇女写的诗, 1749—1980[M]. 印第安纳波利斯: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1.
- [3] 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6.
- [4]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5] 翁德修, 都岚岚.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M]. 长春: 吉林

大学出版社, 2000.

- [6] 程锡麟. 赫斯顿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7] 鲍晓兰.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5.
- [8] 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9] 林树明. 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0]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编辑: 朱渭波)